

关汉卿的历史地位再回顾

——基于清以前曲论诸家的不同评说

徐子方

内容提要 从元代的周德清、钟嗣成到近代的王国维、吴梅,历代曲学家都为关汉卿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受到了一些挑战,关汉卿的成就和地位还是为元明清三代的有关人们所公认。可以说,关汉卿一直为曲坛内外的人们所重视,而并非如同新时期一些论者所言,仅仅是五十年代“大跃进”和大搞阶级斗争的产物。如果将关汉卿研究作为学术专题来考虑,则其源头和基础决不是什麼“大跃进”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亦非一项现代化的“世界文化名人”桂冠,而应该追溯到关汉卿活动的当时以至整个元明清曲坛,这实际构成了现当代关汉卿研究——关学的基础。

关键词 关汉卿 古人 评说

徐子方,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210098

提及关汉卿的地位,人们马上会想到公元 1958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关汉卿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大规模纪念活动。世界和平理事会本身有着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新时期来有论者更将此和当时大陆的政治气候联系起来,认为纯系狂热时代的产物,因而需要“降温”、“重新评价”等等。其实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关汉卿首先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出现的。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纪念活动固然不无政治因素,但也并非凭空而起,说到底它还是由关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这一点尤为重要,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是任何政治或其它因素所掩盖不了的。这也是我们目前研究和评价关汉卿的基础和出发点。

一、独领风骚——元

关汉卿的历史地位首先取决于他生活过并在曲坛独领风骚的元代。

谁都知道,元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北方少数民族第一次夺得并掌握了全国政权。由于自身文化的落后,在亡金灭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他们的武力客观上给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引起新的社会结构之改变,以致出现了对全国民众强分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13BZW085)阶段性成果。

运河城市与明清通俗小说

张 强

内容提要 商品流通给城市扩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宋代以后,运河作为经济活动的大动脉,为沿岸城市走向繁荣注入了活力,为市民阶层的壮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以运河为大动脉,运河城市在商品流通中促进了不同区域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话本及通俗小说的创作和繁荣提供了动力。两宋以汴京和临安为中心,话本在传播中受到市民的欢迎。古典长篇通俗小说的发祥地是运河城市,运河城市是话本及通俗小说的策源地和培育通俗小说家的摇篮。通俗长篇小说反映了运河城市兴盛的历史轨迹,给文学叙述增添了新的样式,成就了明清小说艺术的辉煌。

关键词 运河城市 话本 通俗长篇小说 明清小说 商品经济 市民文化

张 强,淮阴师范学院运河与漕运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223300

自兴修运河后,中国的城市布局开始发生变化。此前,城市主要依河流而建;此后,出现了依运河而建的城市。运河城市的增加是在运河交通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运河改变了旧有的交通和城市布局。有宋一代,运河作为经济大动脉在创造沿岸城市商业繁荣的同时,在冲击原有户籍制度中确认了市民的城市身份。在这中间,一批艺人为了谋生将目光投向市民,在迎合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同时,创造了以话本为主流的市民文学的辉煌。明清两代,漕运及商品流通提升了运河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运河城市不但成为商贸往来的集散地,而且形成了以运河城市为区域经济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势态,从而使运河城市成为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城市。当运河给沿岸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时,运河城市的率先崛起改变了城市发展的面貌。这一时期,生活在运河城市的小说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面向市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为市民服务的文化责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运河与运河城市串联起通俗文学的历史,造就了明清通俗小说的辉煌。由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缺少足够的认识,本文打算谈一谈运河城市与明清通俗小说的关系,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运河城市与市民

城市规模扩张的动力源于商品经济。当城市功能向经济领域延伸时,一方面吸引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流通领域中确立的商品意识又反过来促进古代城市

晚明金陵书坊戏曲印本经营策略考论

赵林平 许建中

内容提要 晚明金陵戏曲刻印繁盛,各书坊为适应激烈的竞争,在戏曲文本的编订质量、编排形式以及广告宣传、销售渠道等各个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经营策略,并在一定范围内版片交换或租赁,表现了精明的合作意识。晚明金陵书坊施行的这些措施,拓展了戏曲文学的传播通道,扩大了戏曲印本的销量,并且加速了戏曲文学的体制规范化,提升了戏曲娱乐的社会普及化,同时也有效地保存了前代戏曲文献,为戏曲在明清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金陵 书坊 戏曲印本 经营策略

赵林平,江苏省扬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生 225002

许建中,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25002

金陵“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1],向来是官僚缙绅、文人骚客和富商豪贾的云集之地。戏曲的表演和创作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现象,自明中期以来便已成为金陵地区文人生活的娱乐方式。成、弘间官至指挥使的陈铎,日以曲乐为娱,“几度闲寻旧谱,试学新声,欲演还抛下”^[2];徐霖则是“活跃于明初南戏向传奇过渡时期的弘治、正德至嘉靖初三朝的重要曲家”^[3],“善制小令,填南北词,皆入律,棋酒之暇,命伶童侍女,被其新声,都人竞传而歌之”^[4];嘉靖间朱曰藩与何元朗、金在衡、陈九皋等诸多留都文人“相与选胜征歌,命觞染翰”^[5];万历以后更是一派笙歌艳舞景象,全民娱乐其中,不但家乐演出频频,“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6],汤显祖、汪廷讷、陈苕卿、阮大铖等均创作戏曲于此。城市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刺激了通俗文学消费群体的成

本文系江苏省 2013 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晚明书坊刻印戏曲研究”(编号:CXLX13_889)的阶段性成果。

[1]张瀚:《松窗梦语》,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卷四第 83 页。

[2]陈铎:《可雪斋稿·初夏题情》,谢伯阳编《全明散曲》,[济南]齐鲁书社 1994 年版,第 644 页。

[3]邓长风:《徐霖研究——简论传奇〈绣襦记〉的作者》,《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0 页。

[4][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丙集第 350 页,丁集第 449 页。

[6]侯方域:《壮悔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40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卷五第 16 页。

清末文人西方书写策略及其地域特征

——以袁祖志与潘飞声的海外行旅书写为中心

郭文仪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梳理袁祖志与潘飞声的海外经历,发掘两人在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采取的特殊书写应对策略。这一策略不同于其时的官方书写,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焦虑下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及复杂心态,并着重探讨在现代性意义上的海外行旅书写开始之初,两地文坛的代表作者采取不同书写策略的原因与意义。

关键词 袁祖志 潘飞声 海外行旅书写 书写策略 现代性 地域文化

郭文仪,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210023

1883年,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率员赴欧考察,当时在上海文坛颇有影响的袁祖志也在随行之列。赴欧期间,袁祖志不时有诗文通过电报即时发表于《申报》,引起广泛的唱和。归国后,《谈瀛录》便结集出版,畅销一时,以至数次再版。《谈瀛录》的成功直接促进了类似海外行旅书写的出版。这些作品以猎奇、异化的书写策略迎合并引导了上海读者的文化品位及对异域的集体想象,又促进了更多类似的海外行旅书写的出现。

而在稍后的广州,潘飞声接受德国当局的邀请,前往柏林教授汉语。潘飞声逗留柏林期间作品《海山词》等亦在归国后相继刊刻出版。与袁祖志等人的行旅书写相比,潘飞声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刻意寻常”的风貌,其作品传播范围与影响也与袁祖志大不相同。而通过这两种面对西方文化的不同书写策略的对比观照,或可对这一时期文人面对西方的复杂态度以及其时沪、广两地文化性格的地域性特征有所了解。

一、清末“现代性”意义的海外行旅书写的产生

1877年1月,受马嘉礼教案影响,清政府第一个驻外使馆在伦敦创设,郭嵩焘出任公使,此后因中西交流日益频繁,“现代性”意义上的海外行旅书写也开始出现。

这里所谓的现代性,是指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所谓的包括社会制度和精神气质(体验结构)层面的结构转变的“总体转变”。在这一定义下,心态的转变是现代性总体转变过程中最深层和最根本的部分。从行旅书写的角度说,当人们初步地具有多元跨国经验时,心态发生转变,中心/边缘、凝视/

本文系 2012-2013 年度国家高水平公派联合培养博士期间的阶段成果。

周作人与顾颉刚：“五四”民俗学的双重变奏

——《歌谣周刊》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

卢文婷

内容提要 在讨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时，论者常常过分关注《新青年》对西方传统的引进，而忽略以中国民俗学探索为基本思路的《歌谣周刊》。以周作人与顾颉刚为首，《歌谣周刊》吸收了赫尔德及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影响，从民族传统入手，既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同时也开辟了西方影响以外的本土新文学资源。经由《歌谣周刊》的探索，周作人与顾颉刚从启蒙与寻根角度分别发展着自己的文化理论，而这两种文化向度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 周作人 顾颉刚 民俗学 《歌谣周刊》 德国浪漫主义

卢文婷，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430074

1924年林纾的逝世常被文学史家视作一个象征性事件：在这场两代人之间的语言战争中，父辈以死亡宣告了子辈最终的胜利，白话战胜了文言及其意识形态。事实上，这场战争早在开始时就已决出了胜负，林纾的去世只是为历史提供了一个姗姗来迟的编年史象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显然深刻理解了这一象征，在哀悼与纪念时，他们对林纾表现出了罕有的宽容、认同与接受。当白话文已然取代文言成为合法语言时，林纾也就无需再被作为假想敌——毕竟是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道路，为年轻的“五四”作家们建构了最初的文学与世界想象^[1]。然而这种宽容只能在战争胜利后的20年代出现。当新文化运动正全力以赴攻击贵族文学、文言文与旧传统时，平民文学、白话文与新传统显然是无可置疑的未来。但是当前者终于被清除出境之后，留给作家们的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巨大文化真空：白话能否真正成为文学语言？平民文学究竟在哪里？谁能建构新传统？新传统为谁建立？西方文化能够顺利成为中国的新传统吗？到了20年代的文化建设时期，这些问题逐渐变得无比复杂。既然新文化运动已经勇敢地将文学语言分为贵族与平民两个向度，并将平民文学视作“非人的”贵族文学对立面时，那么胜利者们就必须为他们的理论寻找证据。事实上，几乎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周作人、顾颉刚等人即已开始了对平民文学谱系、内容与意义的追寻。

[1]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16页。

具有物质性特点的语言

——论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李永新

内容提要 雷蒙德·威廉斯不但批判地接受了以利维斯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而且将其与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抛弃了利维斯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但接受了其理论分析路径与文化批评方法,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既强调语言的物质性特点,又以此为切入点,将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具有空间隐喻特点的完全不同的领域有机联系起来,在深入分析文化内部结构层次的基础上理清了文学与社会、权力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英国文化批评 马克思主义 语言 文化唯物主义

李永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10097

如何有效地分析并阐释文化与社会、权力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威廉斯一直努力思考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威廉斯也正是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思考的基础上,最终于1978年提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约翰·希金斯后来指出:“作为文化的唯物主义,威廉斯试图为他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命名,但是作为文化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又指明了他对仍在发挥作用的现有的英国文学研究体制的文学分析理论与实践的一种回应。”^[1]威廉斯的确既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又在承续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反叛。但是,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是,威廉斯是如何将两种复杂的理论传统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近30年的思考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此外,威廉斯尽管多次提到“文化唯物主义”并不断对其进行界定,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素。这在增加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的同时,也为结合威廉斯思想的发展深入分析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提供了良好契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唯物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演进逻辑”(13CZW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演进逻辑”(10YJC751050),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研究”(2010SJB750014)的阶段性成果。

[1]John Higgins,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25.

桑塔格文学作品中的 旅行思想及其情感叙事

张 艺

内容提要 梳理桑塔格的全部作品发现,她在虚构类小说的创作中发展了“旅行”作为“自我风景发现”这一西方浪漫主义写作传统,将自我发现与理想乌托邦的寻找加以联系;在批评性散文的写作中,将对自我的关注置于历史意义的语境,对文学的功能及思想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桑塔格的旅行观和其作品具有同构关系,文本的情感格调发生于流散的乡愁和文学召唤的双重情结;叙事赋格则源自对主体及族群创伤记忆的再现和重构。

关键词 桑塔格 文学作品 旅行思想 情感格调 叙事赋格

张 艺,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210094

美国著名批评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桑塔格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旅行家。说她是“旅行家”是因为她不仅效法哈利伯顿走遍天南地北,而且她还如同本雅明一样本身就是一位“思想的漫游者”。她在《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一文中如斯阐述小说家的性质:“小说家是带你去旅行的人。穿越时间的旅行。穿越空间的旅行。小说家带领读者跃过一个豁口,使事情在无法前进的地方前进。”^[1]“文学是精神旅行,旅行到过去……旅行到其他国家。”^[2]俄罗斯著名符号学理论家巴赫金认为,“经过作家的精心构思,空间标识和时间标识融为一个具体的整体。时间似乎变得厚重,有血有肉,成为可见的艺术元素;空间则变得意味深长,呼应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时间轴和空间轴相交叉,时间标识和空间标识相融合,这就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3];小说家能够运用叙述策略和语境设计,穿越时间的长河,连接不同的空间,制造出人群相遇的“想象社区”^[4]。亚当斯在《旅行文学和小小说的进化》一书中就指出过,“旅行情节”是想象文学中最基本的情节,因而“几乎没有小说家不把他们小说中的人物送上实际的或象征的旅途。”^[5]

本文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苏珊·桑塔格与诺斯替主义研究》(11WWC010)和南京理工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图像”与“叙述”:桑塔格旅行创作“对话性”研究》(30920130132033)阶段性成果,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4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大会文学、历史学与艺术学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

[1][2]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第184页。

[3][4]Mikhail M.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84, pp.243-244.

[5]Percy C. Adams, *Travel Liter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ovel*,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148-149.